

《毡乡春秋·柔然篇》

篇 一 绪 论

——“对于过去有了认识 就会使他们不去过分急忙地追求享受现时的成就，而要想到未来，竭力加深和扩大我们更好地但还非轻快的日子中不是他们自己所夺得的和赚来的好东西。”

——高尔基《农村史》

（一）一座大山

在人们试图逐步探究北方游牧民族历史真实的过程中，现在横列于面前的是涵幽叠翠、连绵起伏、需要更加放眼、不怕跋涉的万里峰峦，这就是被史家诬称的牧人之国——柔然。

柔然的出现，是历史趋势的必然。当然，也是历史主宰的责成。使无柔然，毡乡其奈离乱何？没有柔然，强敌压境，北方终将何以堪？形势之手将柔然从后场推向了前台。然而它身临其境

的却是一个劫后疮痍、鸿惊鹤怨的苍凉空间。不是吗？

唐人李华写道：“秦汉而还 多事四夷 中州耗敎 无世无之。”他这是感伤他的同胞的苦难而不是痛惜“四夷”的灾殃的话，然而不能说这几句话只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空头文藻。秦人北逐匈奴，姑且不说。前汉的将军卫青、霍去病“马踏”匈奴，单于弃地而走，“漠南无王庭。”王庭”在阴山。阴山从此变成了豢养“南单于”的厩圈。“单于每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后汉的窦宪、耿夔等“豕突”毡城，单于“逃亡不知所在”。史家以为“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北宋时的御用史家据此也说“北匈奴地遂空。”①“遂空”就是罄尽无余，一无所有——没有国家、没有社会。一句话：除了天黏衰草，霜风凄紧之外，甚至也没有哺乳类。当然，这里包含着文人的弄笔成分，甚悖于情理。

以理言之，一个广袤万里，屏山阻水；往来迁徙，不常厥居，向来不以一时一地得失为计的游牧社会，随时“空”一片原野，渺不见人，无非等闲，未必就是窦宪之辈使其“地空”的。在战时，敌人入境，习惯上也是闻风传檄，匿迹清野，空谷避锐，窦宪所见，类即如此。班固党宪，故作此惊人之笔。我倒怀疑，窦、耿等师老还军，反而可能突然受到了匈奴长围铁骑的邀击，亦如当年汉将李陵、贰师所经那样。只未被俘虏罢了。

以情言之，窦宪回兵之后，正如先前的卫、霍进兵之后那样，匈奴地区不论大漠南北，不是依然箭歌骑曲、穹庐烟直的吗？就是后汉边城的戍卒，境上的烽台也还不见减少，那未必是徒然对付“塞北地空”的吧！

然而战火所招致的残破之重却是真的。“斩温禺以衅鼓 血尸

逐以染羯。”匈奴地区是“萧条万里、域灭区殫。”^①而所谓单于西走，“余部不知所属”云云，也是真的。“不知所属”就是群龙无首，无所适从。匈奴余众以“鲜卑”自号而奔辽东；逢侯拥众揭竿。此外，驰骋于漠北的氏姓族类，也是源分派异，各不相能。史家范晔说他们“野心难悔，终亦纷纷。”^②这个“终亦纷纷”及“纷纷”所必然酿成的社会动乱，直到魏晋时代依然不止。战争残破之后，域内又如此久久不能统一，秩序也那样惴惴难以稳定。人民的身家性命，安居乐业，因此也只能慨乎言之了。《诗》云：“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对于“王庭”的丧失，人民是不满的，对于人造的纷乱，人民也是不耐的。他们希望统一；希望和平；希望王权出现。“久空重位者危。”这话人民是懂得的。“重位”就是王位，谁来就坐这个“重位”呢？历史选择了郁久闾氏。正是郁久闾人缔造了柔然汗国。

郁久闾氏大概只是匈奴后期的一个族姓，衍而成为“贵种”。然而他们踟蹰一隅之地，并无显迹于世。匈奴败乱，缓急之间，他们铁马蒙毡，继踵而起。以此回天有力，他们把自己带上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郁久闾氏创制定众，易帜改号，所面临的分任是如何兴灭国、继绝世，召“天下之民归心”。他如何进入自己这种建业的角色，其详细的情节，既不见他们自己的记录，今天已经无从领略了。可以盖然想见的必然是历尽坎坷，备尝凌辱。而他们气愤风云，发扬蹈厉，寻找一切可能的际遇，独领自家的风骚；顺应域内的舆情及争取周边交好各族的同情，不但终于在世系不绝如缕中恢弘了匈奴王庭的前绪，开创了新的汗统；并且竟能在残山剩水间建

① 《文选》卷 56。《封燕然山铭》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卷 89。

成泱泱大国，赫然雄飞于匈奴故地，而与骄横北方的拓跋王朝——魏、代相互颉颃者达二百余年之久。拓跋泯灭，它犹屹立二十余年。其气势所示，不说是奇迹，亦可谓异军突起了。北魏对之切齿，嫉为背上芒刺，信非无故。“力缉八荒成一统，不坠前绪肇新元”。柔然称得上是千古一代。

然而这个“千古”铁鍊终于在风雨如晦中被历史楼船冲绝了。“从此龙城已别属，空将碧血溅青门，”柔然毕竟溘然而逝。在它身后一千余年间，它那种峥嵘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可以说已被逐渐淡化以至模糊，就是它幸而残存在塞上的族裔们，对之也很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了，还有谁闻问呢？

自然，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人问或提及，这就是史家。然而在他们的笔下耀然显见的却照例是一种轻蔑的口气。1920年大历史学者梁启超提出：“柔然兴亡皆暂，于我民族之化合影响盖细。”1939年另一位著名的史学者吴其昌也承其余响，断言柔然是“影响极其微小的蛮族。”^②唱此调者也还有人。梁、吴二氏是名人名笔。其立论绝不是剑头一映，而可以“影响盖细”视之的。

所谓“影响盖细”、“极其微小”云云，在语义上不就是它所发生的作用（不论正反）等于零吗？既然前提是柔然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没有能动地发生什么作用，结论当然就是它的经验没有“资治”的价值，因而它也就没有考述的必要。二氏居然出口的论断究竟建立在怎样的依据上，更无一点消息。不过，我倒因此想起先他们一千年前的一位修史人了，这就是欧阳修。这位“自号醉翁”者也曾说：

“呜呼！夷狄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

^① 《国史研究六篇》第 28 页。
《子馨文在》上册，第 23 页。

世次、文字识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①

“夷狄”不足以考述，这就是这个封建卫道者的心术。道理是什么呢？中心就是“夷狄”们游牧不文，“兴灭不常”，归根到底的言外之意无非就是影响甚微吧！

“夷狄”之游牧不文，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与不同阶段。这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发展的普遍规律。史书载明：周族先祖就处于“戎狄之间”。古公改自己的“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②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紂轶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所谓饥则响响，饱则弃余，亦植立之兽而矣。”^③王夫之最讲“夷”夏之防，强调“防之不可不严”，然而他在这里却指出汉族上古也曾经是“夷狄”；也曾经游牧不文，兴灭不常，而史家从没有一人说“乌足以考述”的话，反而是考述者唯恐其不详。为什么“说实话，柔然影响‘盖细’、‘极其微小’”论者的立论，无非是欧阳氏老调的重弹。

任何一个时代，一种人类活动，总是要受身在其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制约的。离开这个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是终究无能为力。以此而论，说柔然的“影响极其微小”，情有可原，然而这种“微小”，岂又只限于柔然？

柔然兴起源渊有自，它的衰亡也不是仓猝于一日之间。它立国二百余年，较它之前的三国（只存 45 年）西晋（只 50 年）；在它之后的隋（只存 30 年）五代（总计 54 年，各国平均只存 10 年）与它同时的南朝四国（总计 170 年，每国平均 40 年），甚至较北魏都长出了好多年，何得谓之“兴亡皆暂”？而上述倏而来兮

①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卷 71。

② 《史记·周本纪》卷 4。

③ 《思问录·外篇》。

忽而逝的各国，何以就没有“皆暂”之嗟？

柔然有国号、有王号、有年号；已在使用文字；已奉行佛教。如此等等，何得厚诬古人，蔑之为“蛮族”？鲁迅曾说：“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①这话当然不是指研究柔然而说的。不过，我倒是想借来引申一下：梁、吴等的笔头一摇，对一切愿意以公道考述柔然的人，为“害则甚大”。

公平地说，柔然是个有土地；有民众；有政权；有章则；有声有色的国家，不是谈不上分量的尘砂。无论以族以名，都是个客观存在，尤其也不是冥冥中的缥缈之象。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从来都是必然规律。不发生影响，不显露作用的事物，归根到底是不存在的。况且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无非就是人们有目的、有预计的活动过程。就是说，人们在历史实践中，总是要力求实现自己的目的；力求对客观事物发生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也实现对自己影响。柔然汗国存在本身就是这种作用（或说影响）的结果。事实上，被影响的对象也不得不接受它的影响。老实说吧：就是昌言其“影响极其微小”这本身，也证明柔然是有影响的。

王夫之曾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故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耳。”^②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认识。柔然“影响极其微小”论者，如果生在柔然时代，身入其境，亲历其事，他就不会不感受柔然的兴衰进退的影响于当时及后世的深切而有动于衷；他就不能不礼赞王夫之的主张。一个徒然泥书的学者不把自己置身于历史实践地去看待千年前的史事；不从当时当地当事出发，而只是以千年之后的陌路客，从他

^①《鲁迅书信集》上册第 269 页。
^②《读通鉴论》卷末《叙议四》。

现时坐在书房里的感觉与想像出发而失其谛思，虽然可以各是其是，而其结论之凿空，恐怕是必然的吧！南宋主张改革，坚持反抗女真的叶适有言：“古今辽阔，学者不推其世观之，难乎其要矣。”^① 可谓至言。

应当承认，柔然是继匈奴之后，第一个树起自己独特旗帜，并世无二的草原汗国。不正是这个大国的存在，弥补了“塞北地空”的缝隙？它在中国史书占有篇幅，被附入“列传”，岂是无谓？

正是柔然的作用，才使原匈奴高原被战乱残毁的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在久历兵燹之后，得以继续获得被利用、开发与改造的可能，才得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充当关内流人寄居的避难所。

正是“柔然”这个现实的精神磁体，成了当时凝聚毡乡各部的引力；成了各族社会成员合族的标志。在塞外，仰柔然鼻息者，包括西域在内，可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的了。

正是柔然再次疏通并保证了西域与东方各地安全的北路通道，使人畅其行，畅其流。

正是柔然锐意开放而不锁国，与周边各族交好，使各种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在毡乡的弘通才有了一个需要的气候。

正是柔然仿学汉法，任用汉人，使用汉式年号；官用汉语文字，促进了“冠裳”文明之花在毡乡的开放，而柔然人之在内地的移居，对“我民族的化合”不也滋生着影响吗？

正是柔然汗国成了偏安一隅的南朝各国辗转交聘、遥相呼应以抵制拓跋人在北方的强大与国。

“如今国事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这正是南朝诸国在拓跋人的进逼下所处的危境，然而正是柔然对拓跋的捣虚反击，“代京

^① 《刁学记言序目·国语》卷12。

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①北魏“精甲銳師半消折于二虜（指柔然與赫連夏）”力疲于蠕蠕。“兵疲于西北，備弛于東南。”使拓跋“吞宋之心”不能得逞。^②南朝的六代金粉，江南綺羅，才得以竟其豪奢吧！

正是柔然在承嗣匈奴成法的同时，主动实施了很多新的、前所未有的创制，使毡乡社会不致彻底变色甚至泄漏春光而有了某种改进。

正是柔然经行的诸典章制度，成了以后崛起的诸如突厥、回纥、蒙古人依违的先河。蒙古人的历史举止中颇多柔然的前辙，而他们滚滚长流的源头活水原来正是柔然。

正是柔然郁久闾氏的语言，孕育了后世蒙古语言的袞袞动力。而这正是民族形成的基础。

正是柔然踵武匈奴俗尚而风发出的无畏强暴、甘赴艰苦、处则特立、行则独步的精神，演而成了毡乡一直甘心的传统与游牧北族不可衰蹶的性格。

正是柔然的纵横捭阖，拓开了东方历史的领域。可以设问：没有柔然，4—6世纪中长城以北迄南西伯利亚地区的经略，将何以归综？抹煞柔然，同一时期的毡乡历史长河又将是怎样的浪头滚滚而前？

正是柔然的西进及在西方的走向引起了西方史家的兴趣。此足见在世界史上柔然的影响也不便抹煞。日本史家白鸟库吉说：“北方民族无关世界之大势”云云，似乎不免訾訾其词了。

总之，柔然的历史价值据我看，不能说是“极其微小”；对它的史事也不可说“乌足以考述”。李延寿说：北周宇文氏“咸能飞

^① 《魏书·蠕蠕传》卷103。

^② 《读通鉴论·文帝》卷15。

^③ 加文·江布里《中亚史纲要》第83页。

声腾实 不灭于百世之后。’^① 其实柔然郁久闾氏费尽移山心力的丰功伟烈，亦以当此。

当然，肯定柔然的历史的巨大影响，只能就它的这个历史角色去衡量，乖离这个历史真实，兀自在一己的心中设计一种强人所难、无可企及的标准，空谈什么一般的、抽象的影响，显然是不足为训的。要弓马起楼船的作用；要柔然语起汉语的影响；要奋斗产生尺寸的效果，也为常识所不容。

承认柔然的历史价值并从而加以考述，也还有另外的学术意义。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柔然为突厥所代，郁久闾氏亦为阿史那氏取之，它终于弃国而亡了。终柔然之世，它的“国步”有亨通的时候，也有偃蹇的时候。它既有揽狂澜于既倒的经验，也有伤其流逝的教训。而不论正反成败，对毡乡的后世说，都可以是一种精神遗产，都应当总结，就是它的败亡本身也还颇有令人悬度的价值。它是被同为“夷狄”的势力破败的；是与号称强大、殚心竭虑地企图消灭自己的敌手——拓跋人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两两失国的；是在自身国力未必耗尽的时候，而代它而起的“夷狄”——突厥人并不显示更进步中告败的。可以不亡而亡；可以全存而两败，这是怎么回事？《诗》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这是有道理的。柔然的兴衰经历，的确需要从外、从内地加以考述，以成它一面真实的镜子。

（二）浅识经纬

“居今识古 其载籍乎？”这是南朝梁代文人刘勰在相当于柔然那盖可汗中期说的话。话不错，但是要看什么样的“载籍”，并且“识古”也不必只限于书本。文献金石都可以资助。

^①《北史·周宗室》卷 57。

研究柔然，其本国、本族的文献、文物应当是最基本、最直接、最原始、最宝贵的凭据。道理很简单：毕竟是“夷狄”人说“夷狄”事。

郁久闾人也如世界各民族一样，有过它自己的“英雄时代”，并且可以遐想也会因此产生出映照他们本色的英雄史诗，以寄托他们的理想与感情；组织和总结他们的斗争与经验。他们也许没有专门的诗人、特定的说唱分工，但是他们信奉巫覡。并且也有世代相传的职业巫人。巫就是“祝”，而“祝”也可以是“史”。在巫祝或祝史们的活动中，祝词作用至为显著。无论请求弭灾、降福、申愿、问疑，总要结合实际讲情况、述变迁、列功过、拟方略，而这正是口头的“史”书与文献。巫覡就也成了口头的史家与文献家。自然，这些祝词与巫唱不必都是如实的。其中像仲长统所说的“巫覡杂语”类多子虚。如果她与他们通识文字，则口头的祝唱之词也可能变成书面的了。

柔然人的确有官方文字。他们既然与各国的交聘中使用文字，并且颇有骈体文风者，那么，依据一般规律推测，他们未必就一定没有自己经历的书面记述，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为前代的依次继承者，柔然一直是以仿效的眼光眺瞩周边各国的。自第七位可汗社崆开始，不但更主动地与各国信使交驰，而且也在在依据自家的需要，采摭人家的长处。记录标明：各国都有历史记述并设史官。匈奴的前赵有《汉赵记》10卷；石羯的后赵有《上党国记》，以著作郎撰时事；氐人的苻秦有起居住；秃发人的南凉初奠基业即撰述时事，以为“国记”；羌人的姚秦也有史录。至于拓跋魏就更多史述了。所有这些，在历年的交聘与折冲中，对柔然来说，不能不发生“耳濡目染，不学以能”的影响。这还只是从横的、外在的影响而说的。如果另从纵的历史传统看，匈奴曾有自己的图书；在它之后的如突厥、回纥与蒙古等也都有文字

记录传世，那么，柔然独独浑然成史之阙文，宁非倍觉蹊蹊？然而事实证明，至今没有发现柔然人自己的历史记录，甚至一个简目也没有，我想这很可能是被散佚了。《魏书》说柔然“无文记”云云，殊不尽然。

文献资料的散失，可以说几乎是普遍现象。元人马端临说：“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①唐人令狐德棻更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②南朝至唐初，才有多少年？竟然遗散如此。汉地文物制度整备，尚且如此逸佚，何况塞外？隋“大雅君子”牛弘说的文献“五厄”云云，也适于游牧地区。柔然人生活驰驱，戎马倥偬，文献收藏的困难，可以想见，而战争尤其成了它的灾星，拓跋人挟其凶焰，历年扫境寇攘，柔然人护卫身家性命，犹且不暇，保存文献，侈谈都怕来不及。何况“灭史”正是拓跋人欲灭绝柔然的办法之一。当年汉的甘延寿、陈汤辈不是就开过在战争中收缴匈奴单于郅支的图籍而送到汉元帝后宫的先例吗？

柔然的历史文献没有了。也许可以设想在一种什么机遇中将会出现柔然的“汲冢”与“燉煌”，然而在现在要借柔然自身的资料以考述柔然是决定地不可能了。唯一可资借鉴的只有汉文资料。这虽然不必是最原始的文献，毕竟应当是最有价值的凭证。

历来学者很重视所谓“野史”。清人潘次耕以为“野史者，国史之权舆也。”伟大思想家鲁迅也强调“野史”的价值，以为“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③然而述及柔然的“野史”却绝不一见，可见的唯一的只有正史或近乎正史的载

① 《文献通考·经籍序》。
②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卷 73。
③ 《华盖集》第 108 页。

籍。

首先是南朝沈约所撰《宋书》。沈约字休文，今浙江人，历仕宋、齐、梁三代，熟谙旧章、好清淡。公元 488 年（时氏 48 岁）受朝命撰《宋书》，最后定本当在齐、梁间。全书 100 卷，内一卷载《芮芮虏传》。全书至北宋时多有散失。《芮芮传》是否亦佚，不详。今本乃为后人辑补。

刘宋偏安江南，与柔然遥相峙立。双方之间，不特远阻万水千山，尤其紧迫北魏王朝。刘宋在元嘉中以后，与北魏每战辄败，领土大半丧失，以为这是自己没有骑兵所致。“我徒而彼骑，因此而推胜负 殆可以一言蔽之。”① 柔然弓马足与拓跋匹敌 出于抗魏的战略需要，他们乃与柔然交聘。意在造成南北夹击拓跋的局势。柔然亦以相同的原因报聘刘宋。柔然能在《宋书》中占一席之地，实在不是“影响极其微小”所致。

据本书自序，全书所记始于晋义熙元年（公元 405）终于宋昇明三年（公元 479）这正是柔然第 7 位可汗社崆至第十三位可汗郁久闾予成十六年这一时期。它是以前此已成诸史，特别是以徐爰所撰为依据的。徐书未载者，沈氏续补之。诸史是否也录有柔然资料，不得而详。但是沈约所书，当亦不是向壁之作。它或者钞录诸史的旧文；或者采自使柔然而归国者所述；或询诸来聘的柔然使臣；或录于当时社会传闻；或因袭前人成说。其间传闻异词吠影吠声之处，间亦不免。赵翼说《宋书》“记魏事多误。”② 而宋人叶适则说其《索虏传》载事“精实，了然若身履其时。”③ 二说抵牾如此，则疑信也就两可了。柔然记述如何呢？却又都缄口不言。足见柔然对他们是多么地陌生。

① 《宋书·索虏传》卷 95。

② 《廿二史劄记》卷 9。

③ 《习学记言序目》卷 31。

沈约虽躐前人旧迹，不弃柔然而载笔其书，但却是一种不自谅的笔法。称柔然为“虜”，说它是“僭称国号”。“虜”即奴，是低级人；“僭”即越分。所以柔然虽然与刘宋亢礼，却只被“羈縻”之属视之。他把柔然附于《索虜传》，正亦昭示了他可怜的警愾。

《宋书》述柔然事，颇多简陋。百余年史只寥寥扼于五百余字内。一篇《芮芮传》也只以二百字了之。且其中诸如气候、风习等的文字多有因袭前人的痕迹。前人以《宋书》多载朝臣疏奏、表章、诏诰、诗歌等，指为垢病。就柔然而言，我倒以为没有如实录出两国来往书函等文献，实在允为憾事。这种文献不正是柔、宋间国情的实录吗？

北齐王劭说沈约“喜造奇说，以诬前代”。柔然传内亦颇能证验此说。如指“芮芮”是“一号大檀，又号檀檀”。说柔然境内“野无青草”等，就均可视为“奇说”，视为一种“诬”。但是《宋书》也有它书如《魏书》所不载的事，如公元443年（宋元嘉二十年、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柔然吴提可汗十五年）拓跋人大败于柔然；次年又败于柔然菟害真可汗等。所以《宋书》之于柔然也还有用，特别是它的成书，尚是柔然国祚没有移位之时，可以说是“当代”之史，应当珍视。

其次是萧子显所撰《南齐书》。子显字景阳，今江苏省武进人。为原南齐国主宗室。萧衍篡齐建梁，被任要职，主责文书。《南齐书》受命成书于梁天监中（503—510），时已在北魏和柔然的末造。所记上起宋昇明（479）、下迄齐永元二年（500），正是柔然阿那瑰可汗及其以前时期。也可以视为柔然当代之书。

萧齐都建康，主国二十四年，正是拓跋人锐意汉化、南迁洛阳、内部萌乱、国势已寝之时，已无多大能力南侵北掠。而柔然却是予成可汗经豆婁而至那盖可汗势力复振之时。乘时夹击拓

跋，乃是双方的共识。因此尽管柔然“地穷幽都，戎马天隔”，与齐山高路远，而齐则承前朝旧例，仍与柔然隔魏而维持南北交往的关系，较之刘宋时期，甚至知道更多的柔然声息。《南齐书》所以一反《宋书》例，专撰《芮芮虏传》而从《魏虏传》分出，正亦表明柔然在齐人心目中的分寸。它被看作本身的与国，而北魏则是国之敌手。

《南齐书》是参取以前诸种史籍而成的，述事也率多有据。柔然传所据何在，前人没有一说，至今已无从稽考。

历来对《南齐书》的评鹭，或说它保留原始资料较多；或说不多，而更有人说它“虚美隐恶”^①，但这都就一般纪、传而说的，实在无关《芮芮虏传》得失。就柔然而言，诸说都不可执一定之。统观《南齐书》之述柔然事，虽嫌其简略，而较《宋书》在字数上就大有增加，约 1000 余字，所记资料亦不尽属凿空，基本上都是《宋书》乃至《魏书》所失载的，这对考述予成、豆婁及那盖三可汗时代史事，极为珍贵。

萧子显出身皇族，其“正统”观点，当然是得天独厚。他也师承沈约称柔然为“虏”、为“僭帝”。其鄙夷之心，隐然可见。

《南齐书》本有便利条件，载入更多两国间史事。如柔然的历次“上书”，齐人王洪轨出使柔然的情况等，而却竟皆阙笔，且记述中的传闻讹说，亦所在不免。但是它承认柔然在毡乡“擅强专统”却公道得多。

再次是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魏收字伯起，今河北省晋县人。历官魏、东魏与北齐。他受朝命修史，50 岁成《魏书》。这正是柔然末代可汗菴罗辰元年（554），北魏已亡二十年，西魏也即将断统之时。其记述柔然史事主要在书的《蠕蠕传》内。上从木

骨间开始，下迄第十三代可汗阿那瑰初期约二百年的经历，计约五万余字。可视为柔然通史之略。是考述柔然的最重要载籍。

拓跋氏与郁久闾氏同出于幽都；同属于“夷狄”。然而宗分族异，国各统别，南北抗兵，仇若冰炭。又且密迩毗邻，互作窥觐。柔然声势的消长，关系于北魏的利害者，至深且钜。这种情况至魏亡之后，亦复现于塞垣两侧。《魏书》中每有柔然踪迹并专列《蠕蠕传》一卷，实在事出有因。

魏收人品低劣，著名于时。他驱笔作史，只凭自己的好恶、恩怨为准。唐人刘知几说他“爱憎出于方寸，予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必骇物。”^①说他的史是“小人之史”。这就是说，《魏书》是一部体现言行污秽与见闻浅近的作者的史书。这个鉴定准确程度如何，姑且不论，而《魏书》确曾有“秽史”的恶名。宋人刘恕等说它“其文不直，其事不核”，很激起人们的怒怨。所以魏收死后，人们犹发掘其墓，扬弃他的尸骨于野外。述魏事犹且如此，其述柔然的史事，那笔下的诡譎恐怕就更不在话下了。

但是，《魏书》也不是向壁虚构的。在它之前，已有人撰过北魏“国史”。《隋书》说：“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②崔浩“博采”的旧闻中，是否有柔然事，从而在他的“缀述”中加以纂入？书已散失，无从得悉。但是，拓跋人的历史是胎生地伴随着柔然的。没有柔然就没有它的光采。因此可以设想，崔浩的“国史”应当辑有柔然的资料，并且崔浩以汉人而为拓跋作佐，极度仇视柔然，很多屠戮柔然的计谋正是这个姓崔的所策划，一为北魏张目；二为自家表功，其笔下风光能不以柔然

^①《史通·称谓篇》卷 4。

^②《隋书·经籍志二》卷 33。

添色？当然，拓跋中人之撰“国史”，不止崔浩。《魏书》成书正是以这种前人的著录为依据的，其述柔然事大概也不例外。此外，战争往来；谋人出入；特别是柔然人历年入居塞内，都不能不为拓跋史家提供足备参考的情报。《魏书》刊印后 诸史书均被销毁。所以《魏书》资料所据，毕竟也还难以窥测。其《蠕蠕传》至北宋，已是《魏书》诸散佚卷次中的一卷。今见者乃是后人据《北史》抄补的。那么，它究竟是否仍是本来模样，我则无从以证据定夺。

《魏书》记述柔然事，各纪传都有，而《蠕蠕传》更为集中。这是今人之所以得悉柔然史事的主要依据。魏收的记事功绩不能埋没。但综观全书所录，基本上甚至全部文字都是双方的战事——主要是拓跋人攻击柔然的战事（包括进程、谋略及对柔然的讥蔑），即使涉及柔然诸如政制、社会、习俗等时，也多是作为战事的附笔而录入的。

刘知几说《魏书》精神所在是“矜夷狄而陋中华”。其实，它对柔然这个“夷狄”并没有“矜”，有的只是“陋”。它记述柔然，千言万语中，总是灼眼地显示了这个倾向；拓跋圣明，柔然不文；拓跋盛勇，柔然怯弱；拓跋战无不胜，柔然每战必败；拓跋是万国朝奉，柔然则分崩离析。如此等等。拓跋历来以“中国”自居，所以“矜”拓跋，即所以“矜”中国，何“陋中华”之有？曾经又有人说魏收是“党齐毁魏”。魏收父祖三代沐大魏之恩，全书没一句责让之词，又何“毁”之有？从记述柔然事迹看，他反而是党魏的。

李延寿出于感激之心，说《魏书》“繁而不芜，志存实录”。①然《蠕蠕传》岂得当此？不过一卷疏忽有余，存实不足的“失

① 《北史·魏收传》卷 56。

德”之作。它也指柔然为“虏”、为“寇”、为“兽”、为“凶”。它把柔然的起始只上限于“骑奴”木骨间；它混柔然与拓跋“同出一源”甚至是“出于大魏”；它恣意以“魏”语谬注柔然郁久间一系语词；它不承认柔然为汗国，诬之为拓跋“叛臣”，是一帮“逃刑集丑”！如此颠之倒之，信笔由之的说法，完全违反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风范，是应当警惕的。

柔然亡国之后，以后世而追述其事者，也还每每见及。最重要的是唐初史家的撰述。其成书距柔然败亡尚不及百年，并且都各有旧史依据，其史料价值不逊于以上诸史。

首先是姚思廉撰《梁书》。书成于公元 636 年，在其《西北诸戎传》内附有《芮芮传》。主要记述南朝梁代时（亦兼及宋、齐时）的柔然事，除溯及柔然族源外，大约相当于柔然那盖可汗末期以后五十余年间略历。字只 300 余，疏粗与《宋书》相若。

姚思廉，字简之，祖籍今浙江省吴兴。其父姚察仕梁、陈二代为史官，熟谙当时史事。梁世五十余年，柔然尚独步于北方，并与梁朝交聘频仍。其情状始末，姚察当然知之甚悉。他曾撰有二代史稿，其中未必没有柔然一页之地，但书尚未定，他即去世。遗嘱其子姚思廉继成其志。入隋，因种种原因，书终未成。唐初，遵父嘱，受命就遗稿而纂成。此足见书虽成于唐初（公元七世纪初），而柔然史事所据，依然是梁代的资料，亦即柔然时代所录。

《梁书·芮芮传》持论公允，没有侮辱性文藻。称柔然为“芮芮国”，为诸史所不曾有。后人评《梁书》不一，或说它“芜冗”，多载诏令之类。此说不符《芮芮传》，本传之失反而在它的疏简。柔然与梁的交往中，很多情节、文告等，俱被芟除。其中一些文字不特重复本纪，并且也似乎抄自《宋书》、《南齐书》及汉、晋以降诸陈说，未必是梁时所独有。但是姚氏父子的书，毕竟收录了前书所不曾明载的资料。至于限于南北远隔，声息阻滞，传闻